



巴中 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6

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必须认真听课以外，每周还要分组上实验课。我上学期间，巴中新校舍还没有建成，宛朗岸（Blandongan）街的旧校舍太小，物理学实验课只能借用广仁学校教室外的过道进行。尽管条件如此困难，韦老师还是要求同学们一丝不苟地完成各项实验。他还经常以国内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名校的物理学考题作为我们期末考试题目。因此，在我们全班50多名同学中，期末考试成绩能够达到及格分数线的不超过10名。

韦老师经常说，巴中物理课考试成绩达到40分就很不错了。此外，韦老师每年还带领高三同学到雅加达和万隆等地参观一些大工厂，培养我们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的学习方法。教代数和几何课的是刘宏谟和刘宏谦老师，他们兄弟二人都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两位刘老师的教学同样严格认真。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和求实精神，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受益良多。我在上大学以后，才真正

体会到，不仅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必须在中学期间打下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对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同样需要有严谨求实的思维和严密科学的方法。而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当然也需要有历史文学知识和文化素养的教育。

钟士民老师的文史课活泼生动，使我们接触到许多新观点、新视角，使我在选择人生道路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和鼓舞。在巴中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我从一个纯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自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

新生活 新视野

到雅加达巴中上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也是我第一次离开梭罗这个小城市，来到印度尼西亚最大、最繁华的城市。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当时华侨人口最多、聚居程度最高的大城市，它不但拥有著名的班芝兰、草埔等华侨聚居区，还有《新报》《生活报》和《天声日报》三家华文报，以及专营中国书刊的南星书店和OK Sport书店兼体育用品公司。历史

悠久的八华中学以及思想进步的巴城中学和中华中学，更是全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华文中学。特别是它们高中部的学生，除了雅加达本地的华侨子女以外，还有不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华校的优秀初中毕业生。这使我结交了很多新同学、新朋友。

雅加达繁华的街道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对我们这些来自小城市的学生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不过，由于我们这些同学都已带够了衣服和日常必需品，也由于囊中羞涩，所以我几乎没有在雅加达购买过什么衣物。但是，雅加达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确实使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学生大开眼界。雅加达有几家新开张的电影院如Astoria和Deca Park，都是我们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在梭罗只看过几部上海和香港拍摄的国语影片，来到雅加达才第一次看到美国好莱坞最新制作的彩色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讲述波兰爱国作曲家萧邦在巴黎流亡生活的片子——“A Song to Remember”（中文译名为《一曲难忘》）

。雅加达另一处吸引我的地方是铭登（Menteng）的一家欧洲语文书店。当时在雅加达只有这家书店销售荷兰文和英文图书。我曾在那里买到几本英文词典、印度尼西亚文词典和世界地图等工具书，以及我向往已久的莎士比亚全集。

然而，对我来说，来到雅加达，特别是在巴中的学习生活，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使我开始对祖国的前途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心，也促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更加深入认真的思考。在课余时间，OK书店和南星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在那里买到了鲁迅的许多著作，包括小说集和几乎全部杂文集单行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鲁迅的作品，而且立即被鲁迅观察事物的深邃眼光和透彻分析所吸引。特别是鲁迅的杂文集，每本都读了好几遍，以致其中许多段落和警句几乎都能背诵不忘。比起在梭罗侨众生活社读过的巴金等人的小说，我觉得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更为尖锐而深刻，

对人性丑陋面的剖析尤为一针见血。我认为，鲁迅的著作是医治中国社会痼疾的苦口良药。而鲁迅文笔的严谨简练，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我很快成为鲁迅的崇拜者。我在雅加达购买的许多本鲁迅杂文集单行本也跟随我回到了北京，成为我的宝贵藏书。

我在冯伯伯家里天天都阅读《新报》，它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新报》宣扬的华侨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在华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它的评论中肯公允，文字水平也比较高。《新报》每个周末都有半版的副刊，刊登一些评论文章和散文诗歌。不久，我也尝试模仿鲁迅的笔法，撰写一些抨击华侨社会某些陋习的小杂文，以“晨旭”为笔名，投到《新报》副刊。大约是编辑出于对青年学生的鼓励吧，副刊编辑居然相继发表了我写的几篇小文章，还让我去报馆领取稿酬，每篇10盾。这大大鼓舞起我写作的勇气和积极性。于是，我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是《新报》副刊的积极撰稿人之一。